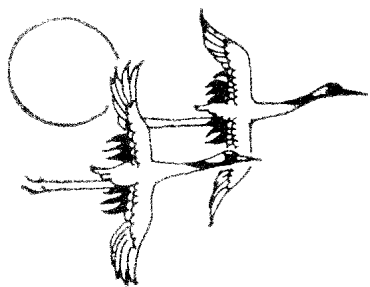


梁容若著

中日文化主流史論

樣初





梁容若著

中日文化主流史論

樣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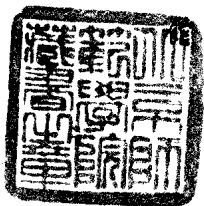


商務印書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39797



1039797

ZHONGRI WENHUA JIAOLIU SHILUN

中日文化交流史论

梁 容 若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统一书号: 11017·736

1985年7月第1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8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 323 千

印数 1,000 册

印张 13 1/2

60克纸本定价: 2.85 元

自序

中日两国自一九七二年恢复邦交以来，关系日趋密切。去年胡耀邦总书记在日本提出开创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的号召，中曾根首相旋即附议成立委员会。最近更有规模盛大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，日本青年一次来华者，数达三千人之多，盛况空前。古人说：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中日两国地理相接，文化相近，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两国联合，从民国三年（1914）五月他给大隈重信首相函中，可知他热望于两国的真诚合作，认为如此能奠定世界和平、树立人类幸福的基础。

历史给了我们很多教训，现在日本之得到大量石油、煤炭、食盐等之供应，不由于武力，而来自亲交；中国的科学技术受助于日本，非由于赔偿，而源于友谊。两国能在经济上合作，进而使十一亿人口团结成一有机体，必能形成和平之决定力量，保障世界安定于无形。《礼运》大同篇说：“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”这是中国人悠久的信念，也可以得到日本识者的共鸣，为两国在合作方面，奠定基本的认识。

五十年来，我想从历史研究上加强两大民族间的深刻认识。“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”，推进共同繁荣，以求合作之道。战后的日

本，不仅很快摆脱了困境，而且发愤向上，在物质文明上赶超了许多先进国家。如钟表赶上了瑞士，汽车追越了美国，造船甲于世界，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。日本在变，中国也在变，两国人民的友谊也应该顺适这种形势，不能不变。我想我过去五十年的研究，不是枉费的。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挡这种形势的变化，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力量能改变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，这是我五十年对两国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结论，相信这是正确的，会得到历史证明的。

中日两国的关系，虽然本世纪的前半是很不愉快的，但从历史上说还是紧密的，尤其在文化上。鉴真东渡，没有携带任何武器，而今日本还尊崇他；朱舜水教了安积觉，在东瀛史学上留下不朽影响。即就我亲身接触的，在本书各文中常有道及的鱼返善雄、青木正儿、实藤惠秀、诸桥辙次、吉川幸次郎诸先生，亦均相爱以德，相濡以沫。这些深受中国文化陶冶的扶桑学人，在两国兵戎相见的天翻地覆期间，没有帮助浪人作错事；到战后又全不改行，仍然继续从事两国文化交流之研究，为世界学术界所推重、钦仰。巴斯德说：“科学无国界”，真正站得住的学术，不分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，都是无国界的，愿以此自勉，并与学术界同人共勉。本书中所收的一些文章，都是我五十年陆续写下的，或者说是用以自勉的一些证据。五十年来，我写过不少有关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字，也曾由海峡两岸的出版家辑为专集，加以梓行，但均已绝版。以后承台北刘德汉先生、华盛顿余秉权教授代将先后发表诸文辑为目录，儿子梁一成任职国会图书馆期间，又按目搜印。此次回国曾携回捐赠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，原意供来者参考而已；不意在京期间，友人钟敬文、常任侠、周一良、吴廷璆、杨秀峰、汪向荣、张香山诸先生见部分原件后，都怱怱整理出版，以使更多人得以参考，也直接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作出贡献。后承香山先生斡旋，决定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出版。奈因我眼疾日甚，不得不再度出国就医，无

法整理修改，因商请汪向荣教授担任，蒙其慨允。汪先生于两国关系史之研究，深有造诣，为海内外学者所推崇；得其整理增补，不惟于我为荣幸，且亦能更便于读者。编辑校讎，端赖商务同仁；书成更蒙赵朴初先生题签，使本书生光不少。爰在此说明经过，并致谢忱。

中日两国的关系，有些地方很象血浓于水的英美关系。英美打过八年仗(1776—1783)，但后来却合作得亲密无间，互相协助。一九七六年女王伊利莎白二世访问美国，庆祝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时，有新闻记者访问她，问到她对美国独立的感想时，她说美国的独立，使英国知道如何与殖民地相处。中日的关系，在性质上和英美不同，但毕竟也打过仗，以后两国如何相处，似亦不无参考之处吧！本书所探讨、研究的问题，都属于两邻国如何友好相处的事。尤其是本书各稿的写成先后历五十年，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十二年之后，由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页地位、中国出版业中长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使太平洋上增添太平气氛。八十老翁，虽远在太平洋彼岸，亦不能不为之雀跃。

一九三六年春，我在从青岛去日本途中，曾于船上咏诗一首：

逃秦义士渡年年，入洛名僧争后先；
交谊两邦馀胜迹，心香一瓣景前贤。
亲还子债隐元语，弟接师魂空海篇；
更无狂飙翻浪日，敞开明镜庆云天。

这诗在当时，可能只是表达我自己的心愿而已，但到今天，却已成了历史的事实，不能不为之欣慰。五十年过去了，特再录于此，以结束本书的序言。

梁 容 若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

于美国蒙西市绿荆街一二一一号

目录 MULO

自序.....	i
---------	---

第 一 编

一个建议	2
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	5
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	23
汉文与日文的比较研究	45
中国与日本文字改革的比较观察	53
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	68
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机运	88
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	96
东瀛的中国戏曲研究	122

第 二 编

唐秘书监晁衡事辑	128
空海入唐求法记	137
圆仁与其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	150
五代日僧巡礼五台之遗物	173

宋末李竹隐海外讲学考	179
元代日僧在华所撰碑	187
朱舜水与日本文化	202
梁任公著《朱舜水年谱》补正	222
陈元赞评传	231
陈元赞诗与日僧元政诗比较	247
明季两戴笠事迹考	255
隐元隆琦与日本文化	275
山井鼎与《七经孟子考文》	292

第 三 编

日本最古之汉诗集	302
日本的《论语》研究	311
评《东洋历史大辞典》	319
森立之与《经籍访古志》	331
评神谷正男著《产语研究》	337
评小松原涛著《陈元赞研究》	342
评诸桥辙次著《大汉和辞典》	347
评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	370
评《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》	387
评《东亚先觉志士记传》	405
评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	413
后记 （汪向荣）	420

第一编

一个建议

文化交流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，不但能促进彼此的进步，而且还是人民间友好的保证。长期以来，国际间都重视文化交流的工作，尤其是在交通发达、世界大通的今天，任何地区、国家都不能再闭关自守，独占智慧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国际局势虽变幻无常，然文化交流却有增无已，其原因即在此。

中日两国，一衣带水，相隔至近；民间往来频繁，且历史悠久，可远溯到上古；文化交流，也源远流长，彼此浸润，互补短长。至今，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的痕迹可见，这就是明证。

中国文化甲于世界，影响几遍及地球每一角落。但长期以来，或因天灾，或以人祸，致文物典籍损毁者极夥。即仅存之文化遗产，在近二、三世纪以来，也因战祸、盗卖等种种原因，不少流失在外。其中有一部分即保存于日本，如正仓院、皇室博物馆、静嘉堂之收藏唐宋文物；东洋文库、宫内省书陵部、东京、京都两大学之收藏中国佚失孤本，都是世所共知的。这些罕见文物和孤善本典籍，都是研究当时中国历史、世界文明的有力根据。

日本虽因地理环境和极少大规模战乱等原因，文物的逸散较少，但在过去和中国频繁往来中，亦有部分已不见于本国，而尚存于他邦者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日本文物典籍受损亦非寡，如冲绳被夷平，记述琉球中世对外关系的文献《历代宝案》原件，亦化为灰

烬，所幸其全部照片尚存于中国。这样的例子还很多。由于两国文化上交往，历史久远，范围广泛，因此罕见文物典籍之为对方珍藏，自属情理之常。今天如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藏，不仅有益于专业研究，即对世界之贡献，亦属匪鲜。

文化合作是一件好事，过去中日两国学者之间，曾有过先例，黎庶昌、杨守敬、张元济、冈千仞等都曾访书异邦，复刻、景印，以补阙失。但他们的工作，都仅属个人行动，不惟力量有限，且在当时技术条件下，亦难尽善，因此所得甚微；政府间虽亦曾注意及此，但往往受政策影响，致收效不多。过去日本曾利用庚款而办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，即其例证。虽然这样，文化合作之为两国有识之士所重视，却由此而得到说明。

现在情势有了很大变化，不但政治上情势有所开展，中日建交已整十二年，两国间已在各领域，包括文化方面进行合作；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，翻刻复制已臻于至善，使过去所难以办到的，今天可毫无困难地完成。日本曾仿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，惟妙惟肖，然未损原物毫毛；美国国会图书馆缩照北京图书馆善本，并以其底片供应世界，不惟其效果远超昔日之复刻、景印，且费用之廉，尤非过去能比。由此可知珍贵之文物典籍，已能在不必损人的情况下，从事利己利人之复制，普遍地供全世界学术界所应用。

为此，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复制翻印珍贵之罕见文物典籍，使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，进而加强、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谊。翻印复制，当然需要费用和技术，我们认为，日本应义不容辞地承担此责任。

在中国，可以不斤斤计较于近一世纪以来，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；可是在日本，却不能因中国之放弃战争赔偿要求，而忽略其曾加于中国的灾难和祸害。尤其是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八年战争，中国战区中的文物典籍，除极个别地区外，几被

破坏殆尽。怎样治疗这种创伤，应是日本道义上的责任，责无旁贷。何况七十年代日本曾以所藏明版善本九百余种，缩微复制后寄赠美国，并捐巨款以发展日本文化。那么今天日本承担这笔费用，不惟用行动说明了其深刻反省的诚意，而且也会为国际文化合作开创良好的先河。相信有远见的日本人士，是会考虑并赞助的；当然，具体的执行，将有待于两国专家们会商、研究，但有一点必须弄清：这是合作，不是施舍；过去失败的教训，应引以为鉴。

我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之研究，垂五十余年，深感两国间的文化合作，是有深刻意义和广阔前途的；相信两国和我们从事同样研究的友人或同行，亦必有此同感。

今天愿假此提出这一建议，供两国政府和文化学术界人士考虑，并翘首企望其成为事实。

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

一 日本群岛与大陆

据地质学家说，在中生代的时候，亚洲东南部和南洋群岛跟澳洲是一块整个大陆，东北部的中国东部和朝鲜、日本也是连着的。到了新生代初叶，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毗连的地方，慢慢地被海水冲断，变成了白令海峡。亚洲南部和澳洲北部毗连的地方，也被海洋冲断成了南洋群岛。日本和亚洲东部连接的地方，因地壳变动，陷落成了日本海，遂和大陆隔断。所以日本群岛自始是大陆的一部分，群岛动植物从古代起就和大陆有密切的血缘关系。日本民族是一个混血民族，爱伊奴、通古斯、马来的成分都有，汉民族的血也占相当数量。所谓邪马台民族（大和民族）的本体是什么，原始文化是什么，在考古学上、历史学上都是暧昧不明的。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日本文化，都是接受大陆文化以后的文化。严格说来，跟朝鲜、安南一样，都是中国文化延长的一部分。许多外国的图书馆、博物馆，把汉、和书物并为一部；因为从远处看，从大处看，彼此相近的地方很多。

二 中国文化东渐大勢

有些历史家以为：隋唐以前，是日本通过朝鲜半岛，间接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；隋唐以后，是日本直接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；明治以后，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时期。其实，日本民族在隋唐以前已经大量混有汉民族。日本海因有左旋回流的影响，由三韩以渡日本极易。据《纪伊风土记》记载，孝昭天皇时（约当春秋末战国初），即有中国遭难船漂流至熊野浦，四人归化日本为新宫氏。《论衡》记：“周成王时，倭人献鬯草。”《山海经》亦记有倭人。近年考古学家谓：日本备后国三原町附近出土之明刀钱，与战国时燕式货币明刀，为同一种青铜文化。传说中，秦末徐福以大量男女东渡，种植、养蚕、医药和百工技艺，均于此时传入三岛。以后汉人东渡者，陆续不绝；此等人皆拥有大陆文化。钦明天皇元年（540，梁武帝大同六年）调查，秦氏一系之户数，达九千零五十三，如一户以五人计，当在四万五千人以上。技艺、富力在当时均占领导地位。从东汉到南北朝，中日已有直接外交，汉光武封倭奴国王，魏明帝封倭王卑弥呼，宋顺帝封倭王武，是最有名的事实。到隋唐，更有大量的留学生、学问僧西来。从来当输入中国文化之冲的外交官、僧侣、留学生、商人，有不少是留日的华侨，或是他们的子孙、亲戚、弟子。隋唐以后，直到清末以前，就是从推古奈良到德川幕府的末年，凡是中国主要的政治学术思想、工业艺术，或快或慢，没有不传到日本的。现在分政治社会制度、文字历史、宗教哲学、文学、美术工艺等方面，叙述如下，

三 政治社会制度

日本最古的政治教化指导方针，是推古帝十二年(604, 隋文帝仁寿四年)，圣德太子所制定的《宪法十七条》。这十七条的内容，是融合佛儒及法家的学说，取材儒家典籍的尤多。因为晋孙绰论儒佛的一致，宋齐间周顒、顾欢辈论儒佛老的同体异用，圣德太子受了他们的影响，也并尊儒佛，以求调和。在日本政治史上，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是两次划时代的进步。明治维新是模仿西洋政治社会制度，大化革新是模仿中国唐代的典章制度。孝德天皇大化二年(646, 唐贞观二十年)始设教官，以留唐回国的僧旻、高向、玄理为博士，参与革新设计。罢私有庄田，行班田制，造户籍，修京师官署、郡国驿站，都是模仿唐朝的办法。到文武天皇大宝中(701—703, 唐中宗嗣圣十八至二十年)颁布《大宝令》。养老二年(718, 唐开元六年)略加修改，几乎全部是抄袭盛唐的律令制度。京都设大学，各国设国学，学校授经书，以卷帙多寡，分大经、中经、小经。考试任官，一准唐制。吉备真备首倡行释奠礼，用大衍历。大和长冈输入唐律，为刑名学的中心。他们都是留唐多年的学生。《大宝令》的官制，一直沿用到明治维新。明治初年的二官八省，到现在中央各部称省，还是承袭《大宝令》。天皇的年号谥法陵寝，无一不仿中国。武则天的当国，并且使日本出了不少女皇帝。平安时代末期，外戚藤原氏的专政，以至镰仓、室町、江户时代的幕府大将军当国，都可以在中国史上找到类似的榜样。德川时代末年的尊王攘夷政治主张，也渊源于我国的《春秋》、《通鉴纲目》等书。

日本的气候风土、农业、生产状态，很类似中国长江流域，因而中国的农民历(夏历)同样适用于日本。跟随夏历的传入，日本的年中行事也中国化。如元旦屠苏酒，三月上巳曲水宴，四月八

日灌佛，端阳竞渡，饮菖蒲酒，七夕乞巧，中元盂兰盆会，中秋赏月，重九登高菊酒，岁除大雉，祭天地祖宗鬼神等节令风俗也传入日本。与节令有关的饮食、服饰、器用，也陆续学习一部分。日本和尚《答风俗问》诗：“衣冠唐制度，礼乐汉君臣。年年二三月，桃李一般春。”极言和中土的类似，就是一切由模仿而来。

四 文字与历史

汉字从何时传入日本，现在还难论定。相传应神天皇十五年（284，晋武帝太康五年），阿直岐自百济东渡，皇子稚郎子从之学。阿直岐举王仁，次年王仁至，进《论语》十卷、《千字文》一卷。《论语》或以为郑玄注，或以为何晏集解，《千字文》传为魏钟繇之作，皇子师之而通其学。普通以为日本习汉文始此。不过西晋以前，中日既有许多交通，且有不少秦汉人移住日本，决不会不携带文字。《宋书·夷蛮传》记有宋顺帝升明二年（478）倭王武上宋顺帝的表文，文词雅饬，象是汉文训练已有相当程度。宋欧阳修作《日本刀歌》，曾经想象秦徐福东行时一定携有大量典籍，秦火未焚的逸书百篇等可能在日本保留。事实上这种古书日本是没有的。汉字传入日本，虽然可能很早，但日本人能充分运用汉文，还要到隋唐时代才实现。日本现有最早的史书是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。《古事记》三卷，太安万侶、稗田阿礼奉敕撰，成书于元明帝和铜五年（712，唐睿宗太极元年），叙述从开辟到推古天皇的事。用汉字和汉字作音标所写的日本语夹杂而成，“或一句之中，交用音训；或一事之内，全以训录。”（太安万侶《古事记》序文）所以称为“准汉文”。《日本书纪》三十卷，舍人亲王、太安万侶奉敕撰，成书于元正帝养老四年（720，唐开元八年），记神代到持统帝的事，体裁模仿荀悦《汉纪》，文章纯为汉文。日本人以《书纪》比拟我国《书经》，以为可不读周

诰殷盘，不可不读《书纪》。以后藤原继绳编有《续日本纪》四十卷，藤原绪嗣编有《日本后纪》二十卷，藤原良房编有《续日本后纪》二十卷，藤原基经编有《文德实录》十卷，藤原时平编有《三代实录》五十卷，合以《日本书纪》为六国史，均属汉文著作。用汉文作历史的流风，一直延长到德川明治时代。

日本史部的最大杰作，为水户藩源光圀倡议所修的《大日本史》。这部史书发凡起例，由朱舜水的弟子安积觉负责。儒臣赓续，到明治三十九年（1906，清光绪三十二年）才全部完成。前后费时二百五十年，为书三百九十七卷，完全模仿我国的正史。本纪、列传、表、志，应有尽有。归纳研究我国正史的长短得失，模仿而独具别裁。汉文也作到畅达明通的程度，比六国史时代的文章，进步多了。书法上如醍醐神功皇后于后妃传，以大友皇子为本纪，以南朝为正统，皆深受《春秋》、《通鉴纲目》一流书的影响。江户末期赖山阳作《日本外史》，记日本军阀的历史，文体模仿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雅驯诙奇，机趣横溢，在中国很快就有翻刻本。编《清史稿》艺文志的人，甚至误会它是华人的著作。这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尊王贱霸，非侵略，重民生，也全是中国儒家的思想。从上述可知，日本明治以前的主要历史，都是用汉文写的，作史的体例，记事的方法，修史的精神乃至修史的宗旨，也都是仿效中国。

《万叶集》是日本最古的和歌总集，由大伴家持编订，共二十卷，成书于八世纪中叶（大伴家持卒于785年）。当时系用整个汉字作注音符号，所谓万叶假名者是。以后才进而成为片假名与平假名。片假名采自汉字偏旁，平假名采自汉字草书。相传写定片假名的是吉备真备，创制平假名、作《伊波吕歌》的是空海和尚（弘法大师）。两人都是曾经留学唐朝的人。中国汉字的数量逐渐增加，从《说文解字》的九千三百文，到《康熙字典》的四万九千多字，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。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《大汉和辞典》收四万九千多